

宗族械鬥中的法律智慧：清代新界習慣法溯源

梅毅

一片沃土，五大氏族，百年契約，在一八九八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之前，香港新界的土地秩序並非由朝廷律法獨斷，而是由一套綿密精妙的習慣法體系所維繫。

一八九九年四月，新界錦田吉慶圍，鄧氏族人依託堅固的圍村和連環鐵閘門，與裝備精良的英軍展開激戰。這場看似力量懸殊的抗爭，背後不僅是保家衛族的熱血，更隱藏着一段關於土地、律法與傳統的深層次故事。而這一切，都要從新界地區源遠流長的民間習慣法說起。

在一八九八年之前，香港新界地區隸屬廣東新安縣，這裏匯聚了鄧、文、廖、侯、彭五大氏族。這些家族早在北宋時期就陸續南遷至此，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成為當地的望族。這些宗族聚族而居，形成強大的血緣網絡，掌握了大量土地資源。土地不僅是財富的象徵，更是宗族命脈所在。然而，沃土有限，族系繁衍無窮。圍繞土地、水源、風水產生的糾紛層出不窮，甚至演變為大規模的械鬥。為了維持秩序，平衡各方利益，一套源於儒家禮治、融合嶺南土俗的習慣法體系逐漸成熟起來。

清代新界的習慣法主要源於兩大傳統：一是中原王朝的儒家禮治理念，二是嶺南本地的土俗民風。在糾紛解決機制上，新界地區形成了獨特的「倒骨價」制度。這種制度類似於湘西苗疆地區的習慣法，即發生人命案件時，通過經濟賠償而非「殺人償命」的方式解決糾紛。賠償標準根據兇手的貧富狀況有所差別。

土地交易和糾紛解決則依靠「太公契約」。「太公」是宗族祖先的象徵。「太公地」又稱「祖堂地」，是新界原居民繼承祖先的土地，其擁有權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整個宗族。這種族產集體所有制源於氏族社會的集體生產方式。土地交由宗族或堂所委任的「司理」負責日常管理，通常出租給族內貧戶或外

姓人耕種，收取的租金存入「太公賬」。「太公賬」的收入用於全族公共事務，如祭祀祖先、修繕祠堂、資助族內子弟參加科舉、補貼婚嫁嫁娶等。在土地糾紛解決方面，「太公契約」是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它詳細記錄了宗族土地的邊界、租佃關係和收益分配方式，有效地防止了土地被不肖子孫變賣，確保了宗族產業的完整性和延續性。「太公契約」通常由族中長老議定，在宗族內部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丁屋制」是新界原居民基於傳統習慣法形成的一種土地權益制度。這一制度起源於清代，旨在平衡土地繼承與人口控制的關係。「丁」指宗族中的成年男性。根據這一制度，宗族男性成員達到一定年齡後，有權申請土地建造房屋。這種權利被稱為「丁權」，據此建設的房屋稱為「丁屋」。這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特權」，而是宗族內部基於血緣的身份性福利，同時也是一種責任。由於土地資源有限，宗族內部制定了詳細的分配規則：通常從宗族共有的「太公地」中劃撥；只有被宗族承認的男性成員才有權申請；所建房屋有嚴格的規制，早期房屋面積不超過七百呎，高度不超過二十五呎，層數不超過三層，不允許隨意買賣或轉讓給外人，防止土地流失。這種限制既保障了宗族成員的基本生存需求，確保了土地資源的合理流轉和利用，又維護了宗族土地的完整性，增強了宗族凝聚力，避免了因土地不斷分割而導致的宗族經濟實力削弱。

新界的習慣法是儒家思想與嶺南地方實踐的精妙結合。一方面，宗族組織完全遵循儒家的倫理規範，強調「敬天法祖」、「尊尊親親」的價值觀。每年春秋二祭，鄧氏便上山祭祖，往往出現逾千人的拜山人龍。這種融合還體現在糾紛解決機制上。當發生糾紛時，往往由族中輩分較高、年歲較長者為領袖進行調解。另一方面，嶺南地區的特殊風俗也被納入

習慣法體系。《大埔縣志》中記載：「獲取獵物後論功分配。放第一槍命中目標者得『一臂三肋』，放第二槍命中目標者得百分之二十，剩下的部分再由參加者均分，每條獵狗也分得一份。」這種基於貢獻的精細分配原則，也體現在土地和資源的分配上，展現出一種重實效、輕虛文的嶺南特色。

一八九八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簽訂，使新界土地的習慣法體系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英國接管新界初期，試圖將英國法律直接適用於新界地區。這一舉動遭到了五大氏族的強烈抵抗，特別是一八九九年的抗英運動，迫使港英政府不得不妥協。他們意識到，強行推行英國法律成本過高，於是採取了靈活策略，即在香港和九龍實行英國法律，在新界實行《新界條例》，保留新界鄉紳的土地所有權，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祠堂、祭祖、納妾，一切照舊。這一政策使得新界習慣法在英國殖民時期得以保留和延續。

為安撫原居民，一九七〇年代港英政府還推出了「小型屋宇政策」，即「丁屋政策」。該政策允許新界年滿十八歲男丁，一旦他們的

父輩能追溯到一八九八年的新界認可村落原住民，有權一生一次申請在指定土地上建造一所符合規制的丁屋。這一政策實際上對傳統「丁屋制」在殖民法律框架下的官方認可和制度化。但由於土地資源稀缺和利益驅動，也衍生出了「套丁」、「飛丁」和「僱建」等問題。這些現象反映了傳統習慣法在現代社會面臨的挑戰和變異。

清代新界的習慣法體系，為我們理解傳統中國的法律多元主義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樣本。它告訴我們，中國古代的邊疆治理智慧在於「大一統」與「因俗而治」的辯證統一。「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則，體現了尊重差異基礎上的統一。這種治理理念對今天的法治建設仍有啟示意義。今天，香港新界的土地問題依然複雜，丁權、祖堂地等歷史遺留問題仍是社會關注的焦點。這些問題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百年前那個習慣法與殖民法碰撞的時刻。回顧歷史，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場關於土地的爭鬥，更是一種文化秩序的延續與變遷。清代新界的習慣法，是儒家禮治與嶺南風土結合的智慧結晶，它曾在漫長的歲月

裏，默默地維繫着那片土地的秩序與平衡。

新界吉慶圍那扇被英軍作為戰利品擄去、後又歸還的連環鐵閘門，如今依然矗立。它不只是一件文物，更是一個象徵。它提醒着我們，法律的生命力不僅來源於條文，更源於它是否扎根於腳下的土地，是否尊重人們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

◀香港新界錦田吉慶圍。



七日談

（廣東篇）



敦煌無界

甘肅省敦煌市的敦煌無界由閒置廠房改造升級建成，由常沙娜藝術中心、四九三畫室、敦煌服飾、敦煌彩塑廠等組成，是集文化藝術、美學體驗與商業創新於一體的文化商業綜合體和藝術美學空間，為遊客提供沉浸式敦煌文化體驗。 新華社



市井萬象



英倫漫話 江恆

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八十年前在英國發生的一起駭人聽聞的事件，便是對這句話的形象詮釋。一九四五年十月，英國政府在白廳舉行秘密會議，由內政部牽頭召集利物浦警察局和移民局等部門參加，會後內政部下發了一份「強制遣返不良中國海員」的文件，相關內容高度保密，不得交國會討論，也不得向媒體透露，更不能向公眾承認。從當年十二月到整個一九四六年，英國警方開始大規模圍捕和強制遣返中國海員。

這些中國海員是誰？他們為何被標籤為「不良」？事情要追溯到二戰期間，英國為解決人力短缺，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在上海、香港等地招募海員，之後總共有二萬名中國海員被送到利物浦，負責帶領英國商船橫跨大西洋，以及承擔為英國運送石油、彈藥和食品等必需品的任務。這些工作既艱苦又危險，不僅要應對驚濤駭浪，還有納粹德國潛艇的猛烈攻擊，船隻隨時可能沉沒，每天都險象環生。據統計，戰爭期間約有三千五百艘英國商船被擊沉，船上的數千中國海員獻出生命。

在這些中國船員身上發生了很多英勇的故事，比如一位名叫潘林（Poon Lim音譯）的人，他所在的英國商船被魚雷擊中沉沒，他爬到小木筏上漂流了一百三十三

天才獲救，因此得到盟軍宣傳片《戰時英國的中國人》的讚揚，稱潘林和他的中國同胞們是「第四軍的英雄」。儘管中國船員的事跡受到輿論的充分肯定，但英國官方對待他們卻態度冷漠，例如在霍爾特的商船上，他們最初獲得的基本工資還不到英國船員的一半，也沒有獲得標準的每月十英鎊「戰爭風險」獎金，如果他們戰死，親屬得到的賠償就更少。

二戰之後，大約二千名曾經出生入死的中國海員因各種原因留在了利物浦當地生活，其中不少人與英國女性結婚生子。原本大家相安無事，但因戰後英國失業率飆升，數百萬人無家可歸，這些外來的中國海員便成了英國當局的眼中釘，希望把他們趕走，以緩解就業和住房等問題，於是他們被貼上「不良」的標籤。

從一九四五年秋開始，利物浦警方對唐人街深夜突襲，大肆抓捕尚無辦理合法身份的中國海員，對於有居留證的人，則沒收相關證件，以抹去他們的任何官方紀錄。英國當局還通知利物浦以外地區的警方同步行動，官方備忘錄中寫道：「如果採取有力措施，將這些傢伙清除出去，應該不難。」據參與拍攝紀錄片《海之嘆息》的英國學者羅莎·方表示，英官方在行文文字上明顯歧視和醜化中國海員，當時住在利物浦的中國人穿着都很文雅得體，連當地主流媒體文章也讚揚中國人的善良、勤奮和自律。

為加速驅逐，英國政府很快將抓捕範圍擴大到和英國女性結婚生子的中國海員，很多人因此突然「人間蒸發」。據一

位中國海員的英國妻子回憶稱：「他（丈夫）在外面打麻將，但人再也沒回來」。留給她們的則是無盡痛苦，至死都不知真相，還以為被自己的丈夫拋棄了。有些人無法面對這種情況，索性將孩子扔給了孤兒院或送給別人，有人甚至考慮過自殺。對於中國海員的子女們來說，要麼靠友人施捨度日，要麼餓着肚子睡覺，整天寄人籬下，充滿貧困和屈辱。有一個孩子長大之後還經常開車到碼頭，看船隻來來去去，他對大海如此執著的唯一原因是——「那有我的父親」。

英國政府的秘密驅逐行為，直到二〇〇〇年代才被中國海員的後代揭露，他們在名為《上海》的紀錄片中，通過對兩位當年目擊者的採訪和大量證據，曝光了英國歷史上這段被埋沒的醜聞。面對外界要求調查真相的呼聲，英國當局無動於衷，二千多被驅逐者名單始終被刻意掩蓋。直到驅逐事件發生八十年後的今天，英國官方仍沒有承認，沒有調查，更沒有道歉。

事實上，這並非英國政府首次這麼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也曾招募了將近十萬名中國男性作為非戰鬥勞工和商船海員，他們為戰爭勝利作出了貢獻，但戰後英方便過河拆橋，將他們無情地驅逐出境，遺憾的是歷史再度重演。

正如歷史學家拉納·米特所說，中國海員是戰爭英雄，他們作出巨大犧牲，但英國政府卻把他們無情地驅逐。這是英國政府有史以來最赤裸裸的種族主義事件之一，是無法抹去的醜聞和污點，更是對歷史的背叛。

秘密驅逐

游弋在厝角的魚(下)

表。當時，兩人相邀申請來了香港。後來秀琴的丈夫從菲律賓來接她，而祖母到底沒有等來祖父。

離秀琴家不遠處是兒時夥伴革的家。革的祖父早年去了菲律賓，留下革一家在家看老房子祭祀祖宗。革的父親心裏野着，五十幾歲還是跑到了菲律賓。再娶了個妻子，又生了四個孩子，加上家裏第一任妻子生的七個孩子，革有十個兄弟姐妹。有一次，參加菲律賓同鄉會聚會，見過革的父親。八十幾歲的人了，還精氣十足地唱了一曲閩南語歌曲《男性的本領》。革家的房子有深井，深井四周是獅形的滴水檐，獅子比秀琴家的還兇。用剪瓷雕出各種花鳥蟲魚，鑲嵌在深井口四周。繞着深井的走廊天棚，有一圈圓圓圖案的燈座，燈座中心都是彩色的猛獸圖案。猛虎、獵豹瞪着銅鈴般的大眼，

扭動着身子，一副下山俯衝的張狂姿勢。蝙蝠和龍，眼神犀利，張開烈焰般的翅膀，似乎隨時要騰飛而起。它們一律張着大大的口，從口中探出一個掛燈的鐵鈎來。

如今，這些魚兒獅子依然俏皮地隱匿在閩南鄉村的屋頂。我們家的房子因為白蟻侵蝕被拆了。當時，房子被一個工程隊拆走了。我篤信那些魚形的滴水檐一定被販賣到了其他地方，那麼可愛的陶器構建有誰捨得敲爛它呢。每到一處舊式的閩南大厝，我都抬眼瞅一瞅那些可愛的魚形精靈。如果碰到那些修舊如舊的閩南大厝，我更要駐足認真仔細端詳它們俏皮的模樣，心裏揣測着，會不會眼前的那隻魚兒就是小時候時常與我對視的那一隻呢？渴望着哪一天重逢，對視的眼神能一如從前熱烈。



自由談 王燕婷

家裏的房子紅磚青石，不是雕琢，簡單而樸實，最熱鬧的大概就是屋頂的魚形滴水檐和那排齊整的綠色琉璃瓶柱。受過私塾教育的祖母管教下的家，一切中規中矩，男孩不敢在外留宿，女孩就睡連姿也被規範管理。祖母的閩南鄰居秀琴家就不一樣，她們家沒有深井，大門口的屋頂一隊整齊的滴水檐，魚形滴水檐間雜着獅形滴水檐。魚兒們搖頭擺尾，獅子威嚴地俯視地面，動態十足。屋頂正中石灰澆築的牌坊上用橙色的瓷片砌着四個字——容膝易安，取自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裏的名句，讀起來滿滿的文藝範兒。祖母和秀琴的丈夫早年都去了菲律賓，兩個番客孀同为縣裏的華僑代

玩轉香港的N種方式



黛西札記 李夢

根據香港入境處公布，今年內地「十一」黃金周期間，首六日共有超過一百一十六萬內地遊客來港，比去年同期增長約百分之五。如今內地遊客來港消費，不只是打卡尖沙咀、銅鑼灣和中上環等傳統商業區，也不僅僅滿足於山頂、迪士尼和海洋公園等熱門景區，更願意尋找小眾悠閒好去處。大型活動固然吸引眼球，維港煙花表演等也是人頭湧湧，而如今，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在特種兵式打卡之外，更偏愛「深度」遊，以藝術、自然或非遺等為主題的小眾藝文遊，因其體驗感與互動性，越發受到追捧。

作家劉克襄曾在《四分之三香港》中，介紹港島、新界和離島的二十多條行山路徑，穿行山林湖海之間，感受繁華另一面的香港。原來，香港有大約四分之三的土地皆為山林，此城亦對環境及生態保護投入頗多，若以此為角度開闢幾條遊覽線路，邀約環保專家分享，加之實地探索，相信能吸引不少登山友或樂意親近自然山野的市民遊

客。再說「非遺」。一些本地出版社曾推出介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系列圖書，圖文並茂，令人稱奇。若能將非遺與旅遊相結合，鈎沉歷史，再結合當下AI科技，打造數個IP（如港式奶茶、舞火龍等），配合舉辦實地探訪、工作坊並結合文創產品之宣推，想來也不乏擁躉。

還有文藝。香港的博物館、美術館和演藝空間愈建愈多，既有坐落在港島的香港大會堂、大館和中央圖書館，也有位於九龍的西九文化區，以及新界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荃灣的三棟屋博物館等等。傳統建築與文化藝術結合的保育路向，塑造了不少既有歷史底蘊又不乏青春活力的文藝空間。若能將這些空間串聯起來，設計一些專為滿足文藝青年看展睇戲的新玩法，配合專業人士導賞及藝術家面對面等增值活動，相信能在一些文青聚集的社交媒體平台上，造一些聲勢出來。

香港的旅遊資源豐富，山林湖海，街頭巷尾，三餐四季，各有姿采。在當下推廣文旅，一定要拿出新鮮的創意，再加上線上線下聯動，定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